

中国民族学科发展60年丛书

ZHONGGUO MINZU
WENXUE YANJIU 60 NIAN

中国民族文学研究

60
年

◎主编

梁庭望 汪立珍 尹晓琳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中国民族文学研究60年

ZHONGGUO MINZU WENXUE YANJIU 60 NIAN

◎ 主 编 / 梁庭望 汪立珍 尹晓琳

I207.9

L413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民族文学研究 60 年 / 梁庭望主编.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 4
(中国少数民族学科发展 60 年丛书)
ISBN 978-7-81108-802-1

I. ①中… II. ①梁… III. ①民族文学—文学研究—中国—当代 IV. ①I207. 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47067 号

中国民族文学研究 60 年

主 编 梁庭望 汪立珍 尹晓琳
责任编辑 白立元
封面设计 乌日恒
出版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100081
电话：68472815（发行部） 传真：68932751（发行部）
68932218（总编室） 68932447（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张：19.75
字 数 34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08-802-1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国民族学科发展60年丛书

丛书编委会主任、总主编 戴庆厦

编委会成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云 峰 文日焕 达力扎布

张公瑾 杨圣敏 苏德毕力格

金炳镐 莫福山 梁庭望

黄建民 熊文钊 戴庆厦

选题策划 宁 玉 晓 默

前　　言

新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学，跟着共和国走过了 60 年的光辉历程，以自己的辉煌为新中国添彩。少数民族文学的辉煌是得来不易的，因为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它连概念都没有。要了解“少数民族文学”这一概念的历史，还得先探索“少数民族”一词的来源。“少数民族”这一概念是孙中山先生首先提出来的。1924 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中提到：“然不幸而中国之政府乃为专制余孽之军阀所盘踞，中国旧日之帝国主义死灰不免复燃，于是国内诸民族因以有机陧不安之象，遂使少数民族，疑国民党之主张亦非诚意。故今后国民党为求民族主义之贯彻，当得国内诸民族之谅解，时时晓示其在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之共同利益。”这是首次提出“少数民族”这一概念。1926 年 11 月，中共中央在对西北工作的指示中，也使用了“少数民族”一词，但当时主要指向族和蒙古族。1928 年 7 月在中国共产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案》中，“少数民族”才正式使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认为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问题……对于革命有重大意义。”这个概念包含了国内的所有少数民族。但当时还不可能有“少数民族文学”这样的概念，“少数民族文学”是 1949 年才提出来的。1949 年 9 月，在筹办《人民文学》过程中，由茅盾起草的发刊词中首次使用了“少数民族文学”这一概念，10 月 25 日，《人民文学》首刊发行，正式宣告“少数民族文学”概念的诞生。但当时还不稳定，因为发刊词中还同时使用“兄弟民族文学”一词。对“少数民族文学”的落实和推动，首先落在中央民族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前身）的肩上。1950 年 5 月，中央任命乌兰夫为中央民族学院院长。9 月，首先开办一个藏语文的短训班，在该班的教学内容中，就使用了藏族文学资料，这可以说是民族文学学科的萌芽。这个班是随后成立的语文系的前身，而语文系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原生点，后来成长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基地。

新中国 60 年来少数民族文学的变化，最重要的是观念的变化。诚然，

中华文学的主流是汉文学，汉文学以其悠久的历史，灿如繁星的文魁，汗牛充栋的篇章而饮誉世界，领衔中华文坛。但人们也终于认识到，中华民族文化是我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同样，中华文学也是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灿烂篇章，是中华文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过去高校中文系那种单一的传统的稳定结构开始发生动摇。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团结的大家庭，因而过去的中华文学或中华文学史是不完整的，它只是汉文学或汉语文学，不能反映中国的文学的全面的、完整的面貌，它不是这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大家庭的真实反映。有识之士开始取得共识，必须改变这种不完整的状态，还中华文学一个完整的面目。不过这是就文学外在的层面而言，如果就民族文学内容形式层面来说，人们必将对民族文学刮目相看。少数民族文学浩如烟海，那异彩纷呈的民歌、奥妙无穷的神话、引人入胜的传说、情节曲折的故事、篇幅惊人的长诗、动人心弦的戏剧，使中华文学五彩缤纷，显示出无限的艺术魅力，这是就民间文学而言的。作家文学也不示弱，在古代，陶渊明、刘禹锡、元结、元稹、尤素甫·哈斯·哈吉甫、萨都刺、元好问、鲁提非、纳瓦依、宗喀巴、李贽、耶律楚材、纳兰性德、郑献甫；现当代，沈从文、老舍、玛拉沁夫、李准、韦其麟、端木蕻良、铁衣甫江、牛汉、乌·白辛、侯宝林、吉狄马加、阿来、叶梅……在中华民族文学艺术的长廊里，哪一个不是魅力四射，给中华文坛添了光彩！想想，如果把异彩纷呈的民族民间文学舍去，把大串光辉的名字抹掉，对中华文坛是多么大的损失！人们终于逐步认识到这一点，观念逐步改变。这一观念的改变，带来了诸多的变化。首先，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科得以生长，并且已经成长为国家一级学科，在 28 所高等学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等研究机构，已经建立了硕士点、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达到了学位的制高点。其次民族文学学科在高等学校是呈波浪式扩展的，先是在中央民族大学等民族系统高校中建立，而后扩展到民族地区一般高等学校，再扩展到全国其他高校。目前正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为核心，扩展到全国其他研究单位。尽管还有部分高校仍固守过去的传统，但是，民族文学学科的辐射也日益强劲。人们认识到在民族民间文学里蕴藏着无数的珍宝，于是到各族生存的丛山瀚海去淘金，民族文学的收集整理，在大规模地开展，一个个资料库的相继建立，一个个网站的相继开通，硕果累累。在新中国雨露阳光的滋润下，从民族文化的沃土里成长了一代又一代的少数民族作家、诗人，至今仅中国作家协会和省区级、地市级作家协会会员就有 5000 多人。作为

他们的后盾和后备军的业余作者，更是超过多少倍的庞大的民族文学大军。他们活跃在占中国 64.5% 的广袤的国土上，用自己的艺术智慧创造了数不胜数的文学精品，使中华文坛熠熠生辉。古今少数民族文学的精品和创造这些精品的文学巨匠们，深深地吸引着学者的目光，于是研究之风蜂起，从个案到总合，从作家到作品，从微观到宏观，从古代到当代，从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文学关系到少数民族文学与周边国家民族的文学交流，在民族文学研究的平台上产生了许多精彩的论述。作为这一切的综合的民族文学理论，不断地演绎出新的理念，作家行藏的追踪，文学精品的剖析，文学特色的探究，民族民间长诗的专论，民族文学史的梳理，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探讨，中华文化板块结构的观照，使少数民族文学理论不断攀升，许多独到的见解的整合，使中国气派的民族文学理论正在形成。理论的探讨和民族文学精品的推介，各种民族文学团体的活动，各种文学评奖奖项的设立，各次民族文学研讨会的交流，以及民族文学多重价值的开掘，使少数民族文学产生的冲击波逐步扩展，其辐射力已经越过国界，逐步让世界各国朋友领略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魅力。这就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辉煌的 60 年。民族文学从得到初步认识到逐步认可，从边缘化到向主流汉文学靠拢，虽然道路不是笔直，毕竟闯出了自己的天下，未来的《中国文学史》将是 56 个民族的文学熔于一炉，而不再是以一代之。经过激情燃烧的岁月，经过改革开放的洗礼，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正在崛起。历史上由于许多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没有产生作家和书面文学。新中国成立以后，这种局面逐步改变，至今 55 个少数民族都有了自己的作家和诗人，都有自己付梓的文学作品，在少数民族中曾经存在的作家文学的空白被填补了，这是了不起的变化。少数民族文学和汉文学的关系是互相影响、互相借鉴、互相补充、互相融合的，在保持各自民族特点的同时，趋同现象也在逐步扩大。这种关系是我国久远历史自然形成的各民族之间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血肉关系在文学上的折射，目前，对这种文学关系的研究正在深入。这种研究，必将促进各民族文学的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未来的《中国文学史》必定是真正的中国文学史——各民族文学融合的浑然一体的中国文学史。

60 年在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史上是短暂的，但成就却很伟大，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本书的目的在于给这种变化立一存照，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希望能给少数民族文学未来的发展出一把力。虽然努力去反映这种时代的变化，终因时间的紧迫和能力的限制，难以如愿。挂一漏万是难以避免的，祈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302) 目录
(303) 图意示辞典文国中
(310) 第一章 从多元到整合的文学理论

第一章 从多元到整合的文学理论	(1)
第一节 民族文学史理论的探索	(1)
第二节 马学良的理论奠基	(9)
第三节 中央民族大学的贡献	(14)
第四节 民族文学定义之争	(26)
第五节 民族文学理论的创新	(35)
第六节 民族文学理论的深化	(60)
第二章 从无到有的民族文学学科建设	(75)
第一节 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历史沿革	(75)
第二节 民族高校民族文学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	(78)
第三节 一般高校民族文学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	(105)
第四节 民族文学学科建设前景展望	(113)
第三章 从搜集到整理的资料积累	(118)
第一节 民间文学资料库	(118)
第二节 文学资料的翻译	(145)
第三节 科学本的诞生	(160)
第四章 从单一到繁荣的发展趋向	(175)
第一节 从分散到庞大的作家群体	(175)
第二节 族别民族文学史编写阶段	(186)
第三节 综合性民族文学史编写阶段	(196)
第四节 中国文学史融合阶段	(209)
第五章 从课堂到社会的文学辐射	(221)
第一节 全国文学舞台上的声音	(222)
第二节 民间文艺家协会	(241)
第三节 各种民族文学学术团体	(245)
第四节 少数民族文学刊物	(248)
第五节 民族文学价值的全面开掘	(254)
第六节 把民族文学变为人类的财富	(279)

附录	(300)
中国文化板块结构示意图	(309)
后记	(310)

(I)	射野学文葩合壁壁元从 章一策
(I)	素馨帕余野史学文蕙因 苛一策
(e)	基奠合壁帕身学吕 苛二策
(T)	矯黄帕学大避因央中 苛三策
(S)	垂玄义宝学文蕙因 苛四策
(32)	謙因帕余野学文蕙因 苛五策
(60)	卦梁帕合壁学文蕙因 苛六策
(52)	好康抒学学文蕙因帕育授天从 章二策
(52)	革部史讯帕养部太人麻好康抒学 苛一策
(58)	养部太人麻好康抒学学文蕙因好高致因 苛二策
(102)	养部太人麻好康抒学学文蕙因好高致一 苛三策
(113)	壁鼎景前好康抒学学文蕙因 苛四策
(118)	累麻抒资帕野壁怪鼎勋从 章三策
(118)	率株资学文同因 苛一策
(142)	餐膳帕株资学文 苛二策
(160)	圭瑛帕本学株 苛三策
(152)	向鼓颈觉帕荣震匣一单从 章四策
(152)	朴辨寒春帕大演匣赠代从 苛一策
(180)	遇僧巨鼠史学文蕙因恨漱 苛二策
(186)	遇僧巨鼠史学文蕙因封合卷 苛三策
(200)	遇僧合壁史学文蕙因中 苛四策
(251)	娘醉学文葩合林匣堂斯从 章正策
(255)	普青帕土台襄学文国全 苛一策
(341)	会树寒苔学文同因 苛二策
(342)	朴困朱学学文蕙因峰谷 苛三策
(348)	醇汗学文蕙因蝶心 苛四策
(344)	麟汗面全帕苗俗学文蕙因 苛五策
(350)	富桢帕类人武变学文蕙因吼 苛六策

第一章 从多元到整合的文学理论

任何领域的开创，都离不开理论的探索和指导，犹如轮船需要船舵。少数民族文学学科是一个全新的学科，没有前例，新中国成立之前还是一片处女地，需要在实践中披荆斩棘，开拓自己的道路。新中国成立 60 年来，各民族学者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导下，艰苦摸索，使民族文学理论研究从无到有，从多元的个案研究到整体研究，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新，并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用以指导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教学和科研活动。

第一节 民族文学史理论的探索

新中国成立不久，各少数民族文学史的编撰工作就提到日程。1958 年 7 月 17 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召集编写各少数民族文学史或文学概况座谈会之后，蒙古族、回族、藏族、维吾尔族、壮族、苗族、彝族、朝鲜族的文学史编写工作便加紧进行。工作进行当中，遇到了若干问题需要从理论上探索廓清，否则编写工作将难以推进。首先是对民族文学史重要意义的认识问题。贾芝在《祝贺兄弟民族文学史的诞生》中指出：“编写各兄弟民族的文学史，不仅能使人们全面地认识浩如烟海的中国文学，而且有多方面的意义。首先，是它的政治意义……在我国，根据党的民族政策和国家的宪法，早已建立了各民族之间平等、团结、和睦、友爱的祖国大家庭。各兄弟民族的文学史，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发动编写的。所有过去被压迫被歧视和生活在不同的落后社会制度下的民族，历史上被遗忘了的民族，如今在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的乐园的幸福时刻里，得到了蓬勃发展……系统地阐述各民族的文学创作经验和成就，使兄弟民族的优秀古典作品或现代作品广泛传播，还足以提高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大家庭的成员之间的了解和团结……其次，研究各民族文学发展史，也是体现党的文艺政策的必要措施……要打破旧传统，创造新传统，推陈出新，就不能不研究各个民族的不同的文艺传统，吸收精华，剔除糟粕……为诗人、作家和参与文艺

创作的广大业余作者向各民族的文艺学习准备条件……最后，编写这些文学史和文学概论的意义，还不止于完成一部比较完整的中国文学史和一部分民族文学史，而且还带动了民间文学的普查采录和各民族文学的研究工作。”^① 以上的三个方面，主要是从政治意义上说明编写各民族文学史的意义。从学术层面上讲，各族文学史可以使人们从历史学、民族学、语言学、文艺学、文化学、人类学、民俗学、宗教学等多角度研究各个民族的历史文化。我国大多数少数民族没有民族文字，口头传承的文学就是他们的历史，所以各民族的文学史有研究该民族的特别价值。由于中华文化板块结构中的中原文化圈处于中心地位，周围绕着三个少数民族分布的文化圈，中原文化圈和少数民族分布的三个文化圈之间的文学互相渗透，不了解少数民族文学史，汉文学史中的若干问题也是难以说清的。中华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编写出 55 部少数民族文学史或文学概况，56 本文学史摆在一起，是何等的壮观！这必将使人们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丰富性和结构多样性有新的理解，有助于改变传统观念中对少数民族的不重视甚至误解；了解中国漫长历史过程中各民族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关系；确定中国少数民族在中华文化和中华文学结构中的重要地位，改变过去《中国文学史》实际上是汉族文学史或汉语文学史的缺陷。此外，由于少数民族分布在边陲，与周边国家民族在文化上和文学上都有交流，因此各族文学史可以为我们研究中外关系提供难得的第一手资料。

当时遇到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作品、什么人可以入史？在讨论中，大家认为能够入史的作家和作品，必须是对该民族的文学发展有一定贡献，或者有比较显著的社会影响的。在这个总的原则之下，各民族对人物和作品的选择，可以根据各自文学发展的具体情况，确定一些符合自己文学发展史的标准，也就是各有所不同。

关于作家族属的鉴别，非常重要，这是编写文学史必须解决的前提之一。在编写过程中，遇到几类比较难以确定民族成分的作家。首先是同一语族的古代作家，由于当时还没有明确分出民族，比较难以确定其族属。对这类作家，需要严格考证。虽然古代一定的时期，民族还没有明确划分，但是考证表明，当时是存在着不同的支系、氏族或部落的，这些不同的支系、氏族和部落，活动都有一定的地域和范围，其迁徙也有路线可循，将这些考证清楚，作家的族属还是可以确定的。有的作家可属于两个

^① 《文艺报》，1960 年 8 月号。

民族共有，不能把界线划得太绝对。古代南方用汉文创作的作家，由于他们一般都不讲自己的民族身份，较难确定。在壮族的一百多个古代诗人中，只有个别人提到自己的民族身份。对这些诗人身份的辨析，主要从四个方面入手：一是看其出生地点，是否是壮族聚居区；二是看有关记载，如县志、府志等古籍，参照研究，家谱可以参考，但由于壮族有攀附中原大姓之风，必须十分谨慎；三是看其作品的民族内容和民族文化印记；四是当地的口碑和民间传说。以上因素综合起来论证，一般可以迎刃而解。

作品的族属鉴别，在1961年制定的《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学史和文学概况编写出版计划》中有了初步的阐明：“判断作品所属民族，应以作者的民族成分为依据。作者无法考查的作品，以在本民族中流传并有本民族文学特色的作品为限。同一作品在两个以上民族中流传，无法判断所属民族者，可作为几个民族的共同的文学来叙述。”关于跨国作品的处理，文件指出：“同一口头文学作品在我国和邻国同一民族中流传，可作为两国人民共同的文学，但叙述时以在我国流传者为依据。我国和邻国同一民族如曾有共同的历史阶段，在这一阶段产生的作品，也应作为两国人民共同的文学遗产来叙述。但从邻国移居我国成为我国民族大家庭的一员的民族，应以在我国产生的文学为限。”这里主要涉及民间文学，没有涉及作家文学，是当时的局限。对民间文学而言，规定还是比较完整的，可操作的。

当时对古今比例争论相当激烈，到底是应该“厚古薄今”还是“厚今薄古”，各执己见。第一种意见主张百分之百地不折不扣地执行“厚今薄古”方针，理由是：“（一）编史的目的是为了今天，肯定过去也是为了今天的需要；（二）‘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历史向前发展，新的总要代替旧的，所以对今天的东西应该给以充分的估价；（三）有的民族（如苗族）过去没有书面文学，今天出现了，这是古今无法比拟的；（四）在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工作中过去有过‘厚古薄今’的错误，应该注意。”第二种意见主张不提这个口号，理由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学遗产的发掘工作开始不久，还没有厚古薄今的倾向，对于古代的东西必须好好地发掘和整理，并且要赶快发掘和整理，因为有的作品是亟待抢救的，不然便有失传的危险，提出‘厚今薄古’对于工作不利。”在当时的情况下，“厚今薄古”还是占了上风。但《人民日报》在报道时也指出：“不能误以为提出‘厚今薄古’的口号便可以轻视历史遗产，对遗产采取粗暴的态度。而且我们是写文学史，应该写出文学历史的全貌。各民族的文学总是古代和近代要比现代的历史长得多，因而在篇幅上古代和近代部分合起来比现代部

分多一些，或者甚至多出几倍，完全是合理的。”^① 1961年4月10日，周扬在少数民族文学史讨论会上的总结讲话中没有强调“厚今薄古”这一口号，而是提“古今比例问题”，并作如下阐述：“首先要研究历史遗产在科学、在现实生活中占有什么地位，我认为占有一个重要的地位。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提出要学习马克思主义，要研究现状，研究历史。学习马克思主义，不研究现状，不研究历史，就是教条主义。”“写历史，古的可以多写。少数民族的历史，有的还搞不清楚，还要大力发掘，古今比例要看具体情况来定。”根据周扬讲话，《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学史和文学概况编写出版计划》中没有提“厚古薄今”这一口号，而是提出“文学史要求写出文学发展的全貌，并且应给予过去的重要作家、作品应有的地位，古今的比重仍应比较适当，比较平衡”，“不宜详略过分，也不宜做统一的规定”。

关于文学史的分期也是讨论得最热烈的问题。有的主张按中央王朝的更替来写少数民族文学史；有的主张寻找各民族文学自己的发展规律，各自划分；有的主张既要根据各族的文学发展状况，也要参照汉文学发展史……这个问题实际是各民族文学的个性和共性问题。民族文学史编撰负责人何其芳于1961年4月17日作座谈会总结时指出：“编写少数民族文学史或文学概况，应该强调各民族文学的共同点还是应该强调特点，也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写文学史或文学概况要有助于我国各民族的走向自然融合，因此应该强调各民族文学的共同性，不应该强调各民族文学的特点；一种意见认为两者并不矛盾，重视并发展各民族文学的特点并不妨碍我国各民族走向自然融合。我赞成后一种意见。我国各民族走向自然融合，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一个远景；不能因此就人为地否定各民族的特点；重视并发展各民族文学的特点并不妨碍这样的趋势和前途，反而可以丰富今天和将来的我国各民族文学的共性。我们的文学史或文学概况既要重视我国各民族的文学的互相影响和共同之处，也要重视它们在内容、形式、风格、技巧等方面的不同特点。”^② 周扬对此指出：“历史分期间题是一个专门性的问题，我看有些问题一时搞不清楚的不一定非要搞清楚不可”，“中国历史的分期到现在还没有结论，而且一时还做不出结论，少数民族，各种社会形态都有，不能要求与汉族一样，能分期就分，一时不

^① 《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史写作的讨论》，载《人民日报》，1961年6月28日。

^② 《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中的问题》，载《文学评论》，1961年第10期。

能分的就先不分。可以写概况。”翦伯赞认为：“以《苗族文学史》为例，是否不要分期，就从作品实际出发，来写苗族文学的历史发展。因为分期是个复杂的问题，像汉族的历史，占有那么多材料，分期还碰到不易解决的问题。”^① 马学良的意见与翦伯赞基本一致，他在发言中说：“分期问题，《苗族文学史》占有材料确实很不够，只从内容来分是不够的，如《开天辟地歌》不一定都是古代的。有些歌亦不必要分远古、近代，只从内容分，有些往往是后代加进去的，也不合适。”^② 根据这些重要意见，《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和文学概况编写出版计划》对“分期原则”做了如下归纳：“各民族文学史的大的分期，应根据各民族社会历史大的分期划分（能与全国社会发展的大的分期一致者尽可能一致，但不强求一律）；至于小的发展段落，则可按照本民族文学历史本身的具体情况划分。分期可以使用我国历史朝代的名称或本民族的特殊的历史时期的称号，但应一律注明公元。”各民族文学史编写组据此放开手脚去研究本民族文学的历史分期，各显神通，分期呈现出多种形态，富有启迪。

座谈会上争论比较多的是民间文学中是否有两种文化的斗争问题，有的人说有，有的人认为不能这样提。说有的人认为民间文学中的两种文化斗争不仅有，而且“很明显，很尖锐，反动思想、剥削思想在民间文学里面有不少的表现”。另一种意见认为，“民间文学是劳动人民的创作，里面虽然也有精华和糟粕之分，那是人民内部的进步和落后问题，因此，不能说民间文学里面有两种文化的斗争，只能说两种文化的斗争在民间文学里面也有反映”。在当时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情势下，何其芳对此只能这样表态：“我觉得这两种意见完全可以统一起来。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这样回答：民间文学里面有两种文化的斗争，但民间文学的糟粕的确很多都是剥削阶级的思想在其中的反映；因此，民间文学里面的两种文化的斗争的形式还是表现得曲折一些，和整个社会上的两种对立阶级的文化的斗争还是有所不同。”还有的人主张文学史里面的两种文化的斗争应当贯穿始终，何其芳认为：“各个民族里面，自有阶级划分以来，都是存在着两种文化的。但两种文化的斗争，并不一定任何时候都表现得同样尖锐，也不一定任何时候都很明显地表现在文学史上。”“还是按照历史事实和现有材料，

① 《少数民族文学史讨论会简报》（一），1961年。
② 《少数民族文学史讨论会简报》（十一），1961年。

能写多少就写多少，不必为了强调贯穿而勉强去写。”^① 这段表态，现在看来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

根据以上这些总的原则，各民族文学史编写组对所承担的民族文学史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关于《苗族文学史》的分期和断代，编写组做了如下工作：“一、探索作品的源与流，根据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判断其作品产生的年代。二、在上一工作的基础上，结合对历史的研究，根据各个时期的历史特点去检验作品的断代是否正确。三、在以上两项工作的基础上，使资料的排列系统化和条理化。”^② 根据排列，将《苗族文学史》划分为远古、古代、近代和现代四个阶段。其中古代的上限划定在苗族西迁定居（秦汉之际），下限到鸦片战争。现代从 1919 年起，历经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时期。

《蒙古族文学史》通过研讨处理四个问题：（一）“正确处理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互相之间在文学上的传统关系，以及他们彼此之间所产生的深刻影响。”蒙古族文学曾经有过独立发展的时代，但是自元朝以后，日益与汉文学和各族文学产生共同性，因此，对早期文学应该立有专章，但是从元代开始，舍弃了“军事封建时期”、“封建割据时期”的提法，分期采用了元、明、清的提法，与王朝更替一致。（二）处理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及苏联蒙古族文学的关系。哪些作品该写进来，哪些作品该划出去？哪里合写，哪里分写？都必须加以解决。像《江格尔》、《格斯尔传》以及尹湛纳希等的作品，产生在我国境内，入史是毫无疑义的。《成吉思汗的两匹战马》则是共有的作品，也应该纳入。在分期上，早期是统一的，但是鸦片战争以后，我国蒙古族文学的发展就有自己的特点了。前苏联也出版了一些《蒙古族文学史》之类的著作，我们的著作也必须处理好与它们的关系。（三）“实事求是地处理蒙古文学史上书面文学与民间文学的地位和相互关系。”“总计七百余年的蒙古族文学史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民间文学和具有爱国主义、民主主义思想内容的进步文人创作是整个文学发展的主流，而民间文学在其中又占着主要的地位。”书面文学包括文人创作和一部分文字记录和整理加工过的民间文学，大体上是用蒙、汉、藏三种文字写作的，有很多优秀的作品。但“与上述各类书面文学比较起来，蒙古族的民间文学是大量的，丰富的，源远流长的，而且其中的

^① 《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中的问题》，载《文学评论》，1961年第10期。

^② 《少数民族文学史讨论会简报》（十一），1961年。

优秀之作大都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和强烈的战斗性，在艺术上也不愧为整个蒙古族文学之冠。正因为如此，蒙古族文学史必须充分尊重这一客观事实，把民间文学当做文学发展的主流来加以论述”。（四）处理好观点和资料的结合与统一问题。^①

《藏族文学史》遇到的文学史分期和作品断代问题，与一般文学史遇到的问题具有共性。编写组在探讨历史分期时考虑到西藏元代进入祖国大家庭这一事实。成为大家庭的一员对藏族文学的发展显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必须据此考虑分期。但最难的还是其他文学史不大遇到的文体归纳分类问题，藏族文学作品有的是散韵结合，有的还有戏剧的元素，这就给文体分类带来困难。这种多种文体混合的状态，还跟文学发展史有关，因此，“如能把某些文体互相涉及、互相混淆之点说清楚”，就可以“使人读了能了然于某种文体的此疆彼界”。他们的做法是在搜集资料时，注意广泛搜集各种体裁的作品，在充分掌握资料的前提下，对作品进行分类排队。事实说明，文体混杂正是藏族文学作品的特点和优点，唱一段，说一段，交替运行，趣味盎然。但不管怎样混杂，在其中总有一种是主要的，主导的，贯穿始终的，其他文体形式穿插于其中，处于辅助的地位，这样，根据主副之分，文体的分类就迎刃而解了。

在壮族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民间文学占有主要的地位，在编写《广西壮族文学》时，首先遇到的是民间文学作品的搜集整理问题。关于作品的选择，强调“符合今天的时代精神”，“对曾经被埋没、被掩盖或者被歪曲的符合今天人民利益的精华，则加以突出，还其本来面目，使其大放光华”。这些提法无疑有当时政治气候的色彩。编者大约意识到这一点，在第三点中做了弱化处理：“整理民族民间文学，是为了更好地继承遗产，发扬民族优良传统，为今天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但是，这种服务有的可能是很直接的、鲜明的，也有的可能是间接的、比较不明显的……不能认为大量优美朴实的情歌没有直接反映古代人民的革命斗争（也有不少是反映封建婚姻制度的压迫的），因而对今天就没有了意义而加以舍弃。”^②

《苗族文学史》的编写首先遇到作品的断代问题。苗族文学主要是民间文学，搜集来大批作品，却一下子无法判断其产生年代，分不出年代就

^① 《少数民族文学史讨论会简报》（十三），1961年。

^② 《〈广西壮族文学〉编写中一些问题的探讨》，载《文学评论》，1961年第3期。

无法写史。为此，编写组用了大量的精力来研究民族历史、研究作品，“一面研究历史，一面作以下工作：（一）探索资料的‘源’和‘流’，根据它们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判别它们产生的时代；（二）在前一工作的基础上，结合对历史的研究，根据各个时期的历史特点去检验资料的时代判别是否正确；（三）再在以上两项工作的基础上，使资料的排列系统化和条理化，再结合历史的研究，逐步地给文学史断代分期。”^①《苗族文学史》在编写过程中一度存在七个问题：一是介绍社会历史与介绍文学作品之间有脱节现象；二是对一部分资料的产生时代判别不够准确；三是对当代民歌介绍比较薄弱；四是资料的运用地区不平衡，苗族分布在几个省区，都应当照顾到；五是一些章节存在资料罗列现象，概括分析不够；六是全书的语言运用前后不够统一；七是对新中国成立前苗族的书面文学介绍不够。《苗族文学史》编写组在克服这些不足当中，对其他民族文学史的编写工作也起到示范的作用。

云南文艺界对云南各民族文学史或文学概况的编写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对若干重要问题取得了共识。关于“文化交流问题”，与会者认为：“文化交流是各民族长期以来，在祖国大家庭中共同创造祖国历史和文化的必然结果，任何民族的文化都不是孤立地发展的，其文学也不可能孤立地发展。但在过去也有人对兄弟民族用汉语或汉语文（如四句调、十二月调等）创作的作品，认为是汉族的，不能入史；大多数人认为这是错误的，汉族的文学形式传入那一民族、已为那一民族所接受而且用汉语或汉语文文学形式来创作，正是表明兄弟民族人民对汉族文学学习的巨大努力及成就，是可喜的事，必须肯定。”^②对于宗教与文学的关系，由于“各民族的宗教信仰反映到文学上来，也极为复杂”。大家认为，“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阶级分析方法，具体对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上的宗教信仰及其对文学的影响，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必须分清原始社会产生的宗教与阶级社会产生的宗教的不同；分清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提倡与利用宗教和人民信仰宗教有本质的不同。”在傣族中，“没有佛教就没有傣族文学的产生与发展，傣族文学就没有特色。理由是：有了佛寺，才有傣族文学，而佛寺是培养知识分子的场所，傣文的贝叶经记下了许多民间文学”。这些看法，现在看来是有局限的，因为佛教传入之前就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参考资料》，第 185 页。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参考资料》，第 35 页。